

未发现的自我

[瑞士] 卡 尔 · 古斯塔夫 · 荣格 著

张敦福 译

第一章 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困境

未来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从难以追忆的远古时代至今，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的心灵。从历史的眼光看，当人们陷入困境，尤其是当人们在物质上、政治上、经济上和精神上陷入困境的时候，他们便怀着焦虑的心情，把希望的眼光投向未来，并且与日俱增地期待着乌托邦观念和天启空想。例如，在纪元之初奥古斯都时代，人们不免对千年至福充满期待和想象；在人类的第一个千年盛世结束之际，人们自然会对西方精神世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加以深思。今天，由于人类的第二个千年盛世也即将走向终结，我们重新又生活在一个到处弥漫着各种令人沮丧的天启意象的时代里，这些天启意象昭示世人：宇宙的毁灭即将来临。那种以“铁幕”为标志而将人类分成两大阵营的分裂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氢弹开始爆炸，或者说如果国家极端主义的精神、道德阴影笼罩了整个欧洲，我们的文明和人类自身发展将面临着怎样的前景？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这种世纪末的恐怖和威胁掉以轻心。在现在西方的每一寸土地上，到处都有一些专门从事颠覆暴动的少数人，这些人在我们的人道主义和正义感的庇护之下，煽风点火、蛊惑人心，而且只有当广大群众结成一个完全一致的、相当睿智的、在心理上十分巩固的社会基础之时，才可以对这少数人形成限

制。除此之外，任何社会力量都无法阻止这些说教的泛滥和传播。不过，我们切不可过高地估价这种社会基础。因为，由于各民族气质的差异，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社会基础也就相去甚远。与此同时，在某些地区，这个社会基础还与公民的教育息息相关，并深受某些令人烦忧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就拿公民投票来说吧，人们可以乐观地把某次投票中投赞成票的选民比例估计到 40% 左右。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其中还可能会有另一种更为悲观的估计，因为推理的才能和批评性的思考并不是人类的杰出特征；而且即便如此，事实也证明它是摇摆不定的，以至于我们看到的一般情景是，政治集团愈是庞大，摇摆不定的特征就愈显著。其实，群众常常会把可能存在于个人身上的独特眼光和独到见解消磨殆尽，这样一来，如果有朝一日，国家政体变得软弱不堪，那么便必然会走向教条主义和专制独裁。

在给定情景下，只有当人们的情绪没有超过某种严格的限定之时，理性的探讨才能得以进行，才可能获得成功。如果情感的激烈程度高于这个水准，理性便很可能丧失一切功能，而且被空洞的口号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所取代。也就是说，一种集体所有物就会应运而生，而这种集体所有物很快地便会发展成为一种精神流行病。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仅仅只能为理性法则所容忍的那些社会因素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类人，在监狱里和疯人院里比比皆是，根本不足为奇。据我估计，在现存的每一种显见的精神病现象之中，至少包含有 10 个潜在的病例，这些潜在的病情一般很少公开爆发，但是，他们的观念和行为尽管表面看来符合正常状态却不知不觉地要受到病态因素和邪恶因素的影响。当然，由于各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关于潜在的精神病的发病率，我们现在还没有医

学统计数据。然而，即使这个数字尚未达到显见精神病现象与显见犯罪现象的 10 倍，他们所代表的相对较小的人数比例，也会因为这些潜在的精神病人所具有的特别严重的危险性而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这些潜在的精神病人的精神状态属于集体冲动型，深受情感判断和愿望幻想的支配。在“集体所有”的状态下，他们适应得很顺利，从随遇而安，进而感到闲适自在。从自己的经验中，他们学习并掌握了这种环境的语言，并且逐渐懂得如何应付这种环境。而且，经由那些盲目的怨恨所激励的不切实际的空想，他们诉诸集体非理性，并且在那里找到了自己滋生的土壤，因为这些空想表达了潜伏在那些貌似理性与睿智的正常人心灵深处的一切动机和一切怨恨。因此，尽管就在总人数中的比例看，这些潜在的精神病人为数寥寥无几，但是他们显然会成为十分危险的传染病病源，因为正是那些所谓正常人在自我知识的能力方面极其有限。

绝大多数人，会把“自我的知识”与他们的个性特征混为一谈。任何一个完全具有自我意识的人都以为他理所当然地了解自己。然而，自我只了解其本身的内涵，它对无意识及其内部与含义茫然无知。人们通常总是习惯于按照社会环境中一般人了解自己的尺度，而不是按照大多隐藏在他们之外的精神事实，来衡量他们的自我知识。在这一方面，这些心理行为的运作犹如人体的生理结构和组织结构的机制一样。而凡夫俗子们对此了解甚少。尽管人们生活在这种结构之中，并与之朝夕相处，但是，其中的绝大部分对门外汉来说却是茫然无知。所以，现在就需要用专门的科学知识来介绍意识与众所周知的关于个体的知识的关系，尤其需要介绍意识与那些虽然目前鲜为人知、但却依然存在的知识的关系。

因而，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知”，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限的知

识，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由仍然存活于人类的精神世界之中的各种社会因素来决定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才会存在着一种偏见，总是认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不会“落在我们头上”，不会发生在“我们家里”，不会出现在我们的亲朋好友或新识故旧之中。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常常又会在无意之中产生各种与这种偏见相左的虚无飘渺的假想，这些假想只能把客观存在的事实掩盖起来。

在无意识——这里的无意识不受意识批评和意识控制的影响——的广阔天地里，我们毫不设防，孤立无援，很容易接受各种影响，很容易患上精神传染病。对所有的危险情况来说，只有当我们清醒地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向我们迎头袭来，这种危害来自何处、何时降临以及如何侵害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想方设法抵御这种精神传染病。由于自知在本质上是一个企图了解个体事实的问题，理论在这方面毫无用武之地。因此，理论的普遍有效性愈强，它对这些个体事实做出应付的能力就愈差。任何以经验为基础的理论，都必然是统计性的，也就是说，这种理论总是提出一种理念上的平均值——这个平均值又总是将天平两端的所有例外平衡下去，并且用一个抽象的平均数取而代之；而在现实世界里，这个抽象的平均数不一定就存在，尽管它在理论上是相当有效的。即使如此，作为一个不容否认的基本事实，它在一切理论中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两个极端上的那些例外都同样有事实的根据，但是，这些例外根本不可能以最终结果的形式出现，因为它们在这个平均化过程中互相抵消掉了。例如，如果我确切地知道一堆鹅卵石中每块石头的重量，并且已经求出它们的平均重量是 145 克，这并不意味着我已经清楚这些鹅卵石的真实性质。基于上述发现，任何一个认为他第一次尝试就能捡起一块 145 克的鹅卵石的人，结果

一定会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实际上的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不论他寻觅多久，他很可能永远找不到一个正好是 145 克的鹅卵石来。

统计方法是善于从理念平均值的观点出发来说明客观事实的一种方法，但实际上，这种方法并不能真实全面地给我们描述那些经验事实。统计方法固然对现实中的某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有所反映，但它往往会以最容易使人误解的方式来虚构客观事实，以统计为基础的理论尤其是如此。不管怎样，真实世界的显著特征在于事实的个性化。如果要给实际情况下一个不太精确的定义，那么我们可以说，实际情况只不过是各种例外所构成的一种状态而已，因此，绝对的真实首先有不规则的特点。

一旦谈到某种对于自知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时，我们心中必须牢记以上各项要点。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以理论假设为基础的自知，因为自知的对象是一个个人——即上述所说的一种相对的例外，一种不规则的现象。所以说，赋予个人特点的并不是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而是为个人所独有的东西。因此，我们不应该把个人理解成为一个周期性出现的单元，而应该把他看作是一个既单一、又独特的存在。而且经过分析，我们最后可以发现，个人既不可知，又不可能与其他的任何事物进行比较。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物种的成员，它可以被当作，也必须被当作一个统计单元来看待，否则，我们就无法对人类进行一般的概述了。出于这个目的，就必须把人作为一个比较单元，与其他物种进行比较。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普遍的行之有效的人类学或心理学，而这样一来，作为一种平均单元，人也就有了一幅抽象的画面，只不过在这一抽象过程之中，个体的一切特征都消失殆尽了。然而，正是个人的这些个性特征，才对我们理解人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打算

了解一个具体的人，那么，就必须把关于一般人的科学知识置诸脑后，并且还要抛弃所有的理论概念，以便我们采取一种全新的、毫无偏见的态度来完成这一过程。如果我要完成理解一个人的使命，我必须有个自由的、开放的心灵，其中对人的知识，抑或对人的特性的洞察，构成了关于人类总体的各种普遍性知识的先决条件。

现在，不管是理解一个具体的人，还是理解有关自我的知识，我都必须把所有的理论设想弃之脑后。由于科学知识不仅被誉为普遍尊重的原则，而且在现代人眼里，它还被当作独一无二的知识权威和精神权威。所以，在理解具体的人时，我就不得不“大逆不道”了，也就是说，我只好对那些科学知识视而不见了。其实，这也是一种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做出的牺牲，因为科学态度难以不费吹灰之力地使它自己摆脱责任感。而且，如果这位心理学家恰巧是位心理医生，他就不但要对他的病人进行科学分类，还要把自己的病人当作一个具体的人来理解，那么他就不得不面对因工作责任引发的冲突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这种冲突：一方面是科学知识所持有的态度；而另一方面是理解他的病人的愿望。两者之间完全对立、互相排斥。实际上，这种冲突和对立不可能通过任选其一的方法来解决，而只能通过一种双向思维——即在思维过程不要顾此失彼而要彼此兼顾——的方法来解决。

大体上说来，人类知识具有某些积极优势，而他们在理解能力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足。就这样的事实而论，我们得出的判断便成了某种似是而非、有些自相矛盾的悖论。其实，在科学的判断中，个人只不过是一个总是在永无休止的重复自己的个体而已，而且可以用字母表中随机选择的任何一个字母来命名这个个人。但另一方面，在理解的意义上，个人则变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个性存

在，这种个人在被剥去了那些使科学家内心非常珍视的一致性和规律性的时候，就完全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个体存在和惟一真实的研究对象。最为重要的是，医生应当意识到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他具备科学训练所赋予他的统计真理；另一方面，他又面临着治疗病人，尤其是治疗精神病患者的任务，而所有这些治病救人的工作都十分需要个人的理解。所以，治疗越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进行，在病人身上所引起的抗拒心理就越强（这种效应通常是立竿见影的），而且治疗的效果也就越差，后果越糟糕。精神病治疗专家发现，不管他们自己愿意还是不愿意，需要还是不需要，他们都要被迫把病人的个性当作一种基本事实来对待，并且依此来安排他的治疗方案。现在，在整个医学领域里，人们已经承认，医生的任务就在于治疗一个特定的病人，而不是治疗一种抽象的疾病。

关于医学方面情况的上述论述，仅仅是一般的教育问题和教养问题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科学的教育主要是以统计真理和抽象知识为基础的，因而它对世界的描绘是一幅理性的不真实的画面。在这幅画里，仅仅作为一种边缘现象的个人，完全如沧海一粟，不起任何作用。不过，作为一种非理性存在的个人，却是客观存在的真实而可靠的载体，是许多科学论述所指的那种与非真实的理想人或者正常人相对立的具体的人。更为重要的是，绝大多数自然科学都在企图纯客观化地表述它们的研究成果，似乎这些成果的得出毫无人的参与和观察，似乎在这些成果的产生过程中，人的精神——一种为科学研究所须臾不可缺少的因素——的合作可以视而不见（在这一方面，现代物理学是个例外，它承认被观察到的客体并不能脱离观察者主体而独立存在）。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科学也给世界描绘了一幅图画，但在这幅图画里，生

动的真实的人的精神似乎是被排除在外了。其实，这恰恰是对“人性”的货真价实的反对。

事实上，在科学假设的影响下，不但人的精神，而且每一个个人，甚至所有个体存在（无论其具体情况如何），统统都被拉平了、均等化了，统统被混淆得模糊不清了。结果，现实的画面被扭曲成了一个概念化的平均值。我们不当过低地估价统计性的世界画面所具有的那种心理效果：它使得一些无足轻重的因素取代了个人的位置，这些受到青睐的因素堆砌起来，就形成群众组织。科学给我们提供的不是具体的个人，与之相反，而是各种组织机构的名称，其最高的层次就是作为政治现实原则的国家这个抽象的观念。如此看来，个人的道德责任就不可避免地被国家政策所取代了。于是，你便失去了个人道德和个人心理方面的特殊性，而只是津津乐道于公共福利的获得和生活标准的提高。于是，个人生活的目标和意义（这是惟一真实的生活）便不再存在于个性的发展之中，而是存在于国家的政策之中；这种国家政策虽然是强加在个人头上的身外之物，是一种抽象人的观念，却要对人类发挥重大的作用，其最终目的是要把生活的所有内容都吸引到自己身边来。于是，个人便被一步一步地剥夺了做出诸如他自己应该怎样生活的这种道德选择的权力。作为一个社会个体，他反而被统治着、被供养着、被别人穿上衣服，接受别人的教育，并且被别人安排在某一单元住房里，按照那些给众人提供娱乐、提供满足的标准而获得娱乐。至于统治者，他们和被统治者一样，都只不过是社会的构成单元；惟一的区分是，他们是国家正统观念的代理和化身。因此，他们无需成为能够做出独立判断的人物，而是一旦离开了他们的职业范围就完全陷于无用无能之中的彻头彻尾的专家。因为，对他

们来说应当教什么、学什么，都是由国家政策决定的。

至于表面上看来是全知全能的国家正统观念本身，则是由那些在政府部门占据最高职位的人们，以国家政策的名义来操纵着。在这里，一切权力都集中了起来。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通过选举，抑或是通过偶然的机遇，只要他爬上权力的阶梯并身居高位，那么他就不再卑躬屈膝于世间的任何权威了。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成了国家政策的化身，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来自由地处理一切国家事务。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他可以说：“朕即国家。”这样，他就是当时举国上下惟一的一个人，或者说无论从任何一个意义上讲，他都是为数极少的个人中的一员，只有这极少数人明白如何把他们自己和国家正统观念区分开来，并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个性。不过，他们仿佛是他们自己所编造的故事中的奴隶。这种片面性常常在人的心理上导致不知不觉的颠覆倾向。而奴役和造反是这种倾向中的两个既无法分开又互相关联的因素。因此，权力和竞争和被夸大的不信任感，便自上而下地弥漫于整个国家机体之中。更有甚者，为了弥补这种混乱不堪的非稳定状态，群众中总是要产生出一位“首领”，而这位首领又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变成他的被鼓吹起来的自我意识的牺牲品。在人类历史上，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这些事例给我们呈现的正是这种情况。

通常的逻辑规律是，一旦个人与别人群集起来并且日趋陈腐之时，变化的产生就在所难免了。广大群众的凝聚将会使个人的个性消失殆尽，除此之外，科学的理性主义是从心理上造成这种群众心理状态和倾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正是科学理性主义剥夺了个人存在的基础和尊严。于是，作为一个社会单元的个人，在这

里便丧失了自己的个性，而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官方统计数字，他只能扮演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作用微乎其微的可以互换的个体角色。用理性主义的眼光或者用旁观者的眼光看来，个人只不过是平民百姓而已，而且从这一观点出发，要继续谈个人的价值和意义，似乎是非常荒唐可笑的。但是，当与此相反的事实显而易见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想象一个人怎么会在个人生活之中被赋予如此之多的尊严了。

根据科学理性主义观点可知，个人的重要性确实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对于这种观点持不同见解的任何一个人，都会在争论中发现自己是理屈词穷的。个人常常感到，他自己或者他的家庭成员或者在他的生活圈子里受人尊敬的朋友们都非常杰出、非常重要。这个事实只能说明，他的感觉纯粹属于某种可笑的主观确信，因为若与一万、十万乃至成千上百万个人相比，一两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个问题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我和一位多思善辩的朋友穿行于一大群人里，一边走一边辩论。突然，他大声对我说：“在这些人身上，你已经找到了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明你对人生不朽的怀疑了：所有这些人都渴望着永垂不朽！”

群体聚集得规模越大，个体就变得越加渺小。然而，倘若个人被他自己的渺小感和柔弱感所征服、所压倒，倘若他切实地感到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毕竟不能与公共福利以及更高的生活标准相提并论或混为一谈——丧失了它的意义，那么他实际上就已经踏上了通往国家奴役的道路，而且由于个人并不了解也不需要这种国家奴役，所以与此同时他便也成了国家奴役的叛逆。一个只是往外看，而且在大庭广众面前畏缩不前的人，根本不可能以此与他的感觉和理智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情况却正好发生在今天：我

们现在都被统计真理和庞大的数字所吓倒、所威慑住了，而且每时每刻都有人告诉我们，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人的个性，人的个性是毫无价值的，因为任何群众组织既不能代表个人的个性，也没有把它体现出来。与此恰恰相反的是，对于不加批判的公众来说，那些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驰名四海的大人物们，却是某个群众运动或某个大众思潮的产儿。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人们既不为这些大人物们欢呼鼓掌，也不会憎恶和唾弃他们。而且由于群众的思想在这里居于主导地位，这些大人物们究竟是为了对他们自己负责而真切地表达了他们自己的心声呢，还是仅仅作为群众思想的传声筒？这仍然是个未能解决的问题。

对个人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难怪他对自己的判断愈来愈难以确定了。他的责任心也尽可能地被集体化了，换言之，个人抛弃了责任心，并把他交付给了集体组织。就此而论，个人就愈来愈具备了一种社会功能，反过来，这种社会功能又剥夺着个人作为真实生活载体的功能，而社会只不过成为一种抽象的观念而已。在这里，社会和国家都被实体化了，也就是说，社会和国家都获得了自己的自主性。国家尤其如此。它成了一个仿佛有生命、有个性的实体，人们可以从其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实际上，国家只是那些谙熟怎样操纵它的个人们的一个幌子。因此，制度化的国家就不知不觉地步入社会情景的原始形式，即原始部落式的共产主义，在这种形式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必须顺从一位酋长或者一个寡头政体的专制统治。

第二章 可与群众观念相抗衡的宗教

为了把主权国家的法律假定——即是说，那些国家操纵者头脑里的国家观念——从各种实际上是有益的约束中解放出来，所有旨在达到这一目的而进行的社会政治运动，都有一个恒久不变的特征，那就是千方百计地去破坏宗教的基础，切断宗教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这是因为，如果要把个人转化成为国家功能的一部分，成为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就必须将个人对于除却国家之外的任何别的事物的依赖完全、彻底地清除干净。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宗教即是意味着对非理性的经验事实的依赖和顺从；虽然这些经验事实并没有直接地指明各种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但是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和范围要比个人的精神状态大得多。

只有在生活的这些外在条件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参照系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对这种生活采取某种态度。而各种宗教所提供的，或者它们宣称能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参照系，因而才能够赋予人们作出判断的能力和作出决定的力量。它们常常要建立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以此来对抗那种不但显而易见而且无所不在、难以避免的环境压迫；否则，他们就要在这种环境的压迫之下，失去内在的世界，除了作为公共场所的这个外部世界之外毫无自己的立锥之地。如果说统计真实是惟一的真实，那么这个现实也就构成了惟一的权威。因此，在我们周围就只有一种条件存在，而且正

是由于没有相反的条件存在，个人的判断和决定就不只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个人就必然只在统计意义上发挥一切功能，因而也只能是一种对国家而言有用的功能，或者说是任何一种能叫得出名堂的社会秩序的抽象原则的功能。

而宗教则教给人们另一种与“尘世”权威截然不同的权威。两相比较可知，个人依赖于上帝，这样的教义与世俗的学说一样，都向人们提出一种很高的要求。有时，甚至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宗教要求的绝对性能够使一个人疏远尘世生活，其情其景与他屈从于集体心理时，他疏远自我的情景完全相同。在前一种情况下，由于宗教教义的缘故，个人所失去的判断能力与决定力量，可以与后一种情况等量齐观。除非宗教向国家妥协，这将是所有西方的宗教所公开追求的目标。而一旦宗教向国家妥协了，那么我与其称之为“宗教”不如把它叫做“信念”。所谓信念表达的是某种确定无疑的集体信仰，而宗教一词，则表示着人与现实的某种具有形而上学性质的、超越所有世俗因素的主观关系。广而言之，信念是一种主要着眼于尘世生活的信仰，因此它属于一种干预现实、介入现实的东西；而宗教的目的和意义却在于个人与（基督教的、犹太教的抑或是伊斯兰教的）上帝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个人与佛教的超度之路和解放之路的关系。所有的伦理学理论都是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派生出来的。倘若在上帝面前不存在任何个人的责任，那么，这些伦理学观念充其量也只能被称为传统的道德而已。

由于这些信念和世俗的现实妥协，宗教信念便随之发现，不得不对它们自己的观点、教义和习惯不断进行整理加工，把它们编纂成为法典，而且当宗教信念这样做的时候，它们也就把自己外在化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它本身所包含的那些真实可靠的宗教因

素——即与超越现实的参照系之间所存在的那种活生生的面对面的接触和关注——全都被推到了幕后。在宗教上持有宗派立场的人，就会用传统教义的尺度来衡量主观性的宗教关系的价值和重要性，与此同时，如果这种情况的发生不那么频繁，比如在新教国家里所呈现的那样，那么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宣称他得到了上帝的指导并且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他马上就会被别人说成是虔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信奉邪教的反常古怪之人等等诸如此类的称呼。因而，信念与业已建立起来的教堂总是相辅相成地苟合在一起。换言之，信念无论如何都会形成某种公众制度和公共机构，其成员不但包括真正的宗教信仰者，而且还包括为数众多、对宗教事务的态度只能称之为“漠不关心”的人们；这后一部分人到教堂里来，不是出于内心宗教信仰的驱动，只是习惯使然而已。在这里，信念与宗教之间的差异就彰明较著了。

因此可以说，对于某种信念的追随，并不总是一个宗教上的问题，更为经常发生的是，它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问题。因此，坚守某个信念本身根本不可能给个人提供任何生存的根基。当然，为了寻求支持和帮助，个人就必须心无旁骛地依赖于他与某种权威的关系，尽管这个权威根本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然而，这里的标准并不是为某种信念服务的口头许诺，而是一种心理事实，即个人的生活既不是由自我及其思想观念所左右的，也不是决定于种种社会因素，而绝大部分地——如果不是完全地——取决于超越现实世界的权威。也就是说，为个人的自由和自主性奠定基础的，既不是众说纷纭的伦理原则（不管它们多么高尚），也不是形形色色的宗教信仰（不管它们多么正统）这个基础仅仅是、而且也只能是经验性的感知，是那种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无可辩驳的体验，是

那种存在于个人与超越世俗性的权威之间的互惠关系，而这种关系则常常在“尘世”及其“理性”之间发挥着平衡与中和的作用。

应当坦诚地说，这样的论述既不能取悦于普通大众，也不能取悦于那些集体主义的信奉者。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国家政策是个人思想和行动至高无上的原则，事实上，这正是社会教导个人的生活目的。进而，这些普通大众仅仅赋予个人这样一种生存权利，即严格地把个人的作用限定在国家职能的范围之内，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螺丝钉，而不许个人越雷池一步。另一方面，集体主义的信奉者在认可国家具有道德权利和实际权利的同时，也坦然地承认，他们还相信不但个人，而且就是统治个人的国家也都必须服从上帝的统治。因此倘若有什么疑难问题的话，那么将会由上帝而不是由国家做出最后的定夺。至于作为人类的现象世界——国家也是广义上的自然界，即所谓“尘世”，它究竟是不是上帝的“对立面”，由于我并不想冒昧地做出任何形而上学的判断，所以就只好把这一问题留待公众去解答了。在这里我只能指出一个事实：在上帝与尘世这两种经验领域之间存在着的心理对立，不仅可以在《圣经·新约》中找到证据，而且即便是在今天，还能通过独裁国家对宗教的否定态度以及教会对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否定态度而得到确证。

人是一种社会存在，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不与社会发生关系，他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因此，除非遵循某种超越现实的原则——这种原则能够与外部世界的强大影响力相匹敌，否则个人就永远无法为自己的生存和自己精神上的自主性与道德提供任何现实的说明。简言之，不皈依于上帝的个人根本不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来抵御尘世生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诱惑。于是，为了抵御

尘世的诱惑，个人在内心深处就需要有一种超越尘世的经验，一种能够保护他独立自主的经验，否则他将不可避免地要服从群众意志，为外物左右而走上人云亦云的歧途。易受大众传播工具影响的普通人往往冥顽不灵而且毫无道德责任感，只要对这种现象从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稍作洞察，就会得到一种令人沮丧的认识，即，它充其量不过是在个人原子化道路上蹒跚学步而已。而且由于这种认识还仅仅是理性的产物，所以它也缺乏宗教判决所具有的那种驱动力量。与中产阶级相比，独裁国家具有一个更为强大的优势，也就是说，在对待个人的问题上，它可以将个人身上的宗教力量吞噬得一干二净。从这一角度看来，就是国家取代了上帝，这种现象便是为什么说独裁是一种宗教而国家奴役则是一种崇拜的根本原因。但是，倘若不是由于个人心中已经对上帝有所怀疑的话——其实这种深藏个人心中的怀疑一旦出现就会立即受到压制，以免它与日趋流行的群众心理态势发生冲突——那么宗教的功能就根本不可能为这种取代方式所混淆、所篡改。这里，常常是用狂热和狂信给予过分的补偿，狂热和狂信就成了足以扑灭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对立思想的有效武器。这是在出现怀疑思想时通常会出现的一种结果。于是，自由的意见受到了窒息，道德的判断受到了无情的压制，其托词不过是目的决定手段，甚至是最卑鄙可耻的伎俩。这样一来，国家政策便成了令人推崇备至的信念，政府首脑或政党党魁就成了超越善恶概念之外的半人半神之物，而他们的追随者也就随之而被人们尊奉为英雄——殉道者、使徒和传教士。在这里，只有一个真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可称之为真理的东西了。而且，这惟一的真理又是神圣不可冒犯的，来不得半点批评和指责，否则，任何与此真理意见相左或相去甚远的人将被视